

陈翰笙

## 难忘的桂林

记片 1942 年春，我到桂林住，真觉得山水竟如画中天下，各不重样；但 1944 年 9 月，我同老伴顾淑英险遭蒋政府军委会逮捕，却是一件终生难忘的事。

1941 年除夕我仍在香港，当日本军舰在厦门放炮时，大石灰记者范长仁，正在半山我伯的寓所谈话，炮弹落在门前，逼得我外出差。次年二月初，我偕同外甥女孙少礼、孙幼礼等，乘运送难民的船到澳门，又从那里经句容、梧州到达桂林。

我到桂林的第二天就碰到范长仁、张友渔、萨空、田汉等友人，不久又见到了柳亚子、丁燮林等，我仍经常在文化界聚会，谈时局、谈遭遇、谈工作。那时桂林师范学院院长林励儒，邀我去谈担任西文系主任职务，每周上课三次。1943 年暑假我应陈竺同先生的邀请，在这师范学院讲印度地理三星期。

过去我在香港时，曾担任工业合作国际委员会的总干事，这个委员会在两年间，收到海内外捐款约二千万美元，分给内地各处工业合作社，我和顾淑英同到桂林后，她还组织了一个化工合作社；同时张锡昌和高竹望等同志，办了工业月刊；孟用潜同志由重庆来到桂林，策动工业合作

社事业。1934年我和吴克敏先生等，在上海继续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，陈米薛暮桥、杨继瑞等同志，在上海主编《中国农村》月刊，我到桂林时，王易今同志等，又在桂林继续编写和发行这个月刊，穆培生老同志在桂林时，还访问过这个编辑室。那时我和王易今、张鹤昌、简竹坚等同志，经常有往来的，日军轰炸桂林时，我曾同简竹坚同志等往地下室躲避。

那时在桂林担任广西民政厅长，兼教育厅长的湖南人邱昌渭，是我在燕京大学时的同学，他常来我家谈话，从他那里我还知道了许多重庆的政局和人事情况。当时李亚群同志和我会面，谈党内问题，我还没有让国民党人知道，邱昌渭还认为我是任桂林、陈云博等一帮的人，因此我在桂林文化界，常一同中外来宾闲谈。有一天我看到薛经国在这里，坐在桌上，两腿下垂并不时摆动，这时一个美国新闻记者，同他谈得十分高兴。那时他在赣州当座，时常乘飞机往重庆去见朱委员，路过桂林时，便住下几天去听他的姓张的<sup>情</sup>妇。

那时我认识驻桂林的英军许多家主任，澳大利亚人赖亚德，他要我介绍一位懂得中文和日文的秘书去帮忙，我便介绍孙亚明同志去帮他的忙。驻桂林的美国副领事查理

· 苟维新，是美国珀玛辟大学毕业生，他毕业后就晚了十  
 多年，他要我介绍一位中文秘书，到领事馆工作，我就介  
 绍了梅永芳同志去帮助他。在桂林英国新庙街的负责人斯  
 密斯，也和我很熟悉。还有在美国新庙街立主任的，又立  
 我的朋友格至姆· 派克。因为我认识这些人，我便经常去  
 这些机关向国外来的难逃报刊，也因为认识这些外国人，  
 后来他们帮助我逃离桂林去印度。

1942年11月，桂林开了“华联十月革命纪念大会”，我曾  
 邀请英国驻广西代理总领事班以安到会，报告了英国反法  
 西斯主义的运动，在桂林的中共党员很多曾到会，去听他  
 这个报告。此事传到重庆后，不久就发生了不幸事件。次  
 年三月，吾友陈此生同志忽来我寓所，要我于次日到他家  
 早点，我去他家时，他立即拉我坐在台阶上谈话，他说，  
 前天军事委员会桂林办事处，接到重庆军事委员会来的密电，要逮  
 捕我，因此李济厅长要他私下通知我，要我和预做型舒  
 快设法离开桂林。我们马上就要在重庆交通部的亲戚，用  
 假名字为我们二人办了赴印度的护照，又在桂林找到了铺  
 位，简竹坚同志又给了我们两人六百美元的旅费，我们乘  
 英军服务处的军车离开桂林去昆明，到了昆明以后第二天早  
 晨，我们就去访问张翼若先生，随即乘人力车到机场，  
 乘英国军用飞机离开昆明，去加午加答。(完)